富士康事件，點燃中國社會、產業、經濟面大調整的引信

「郭台銘效應」席捲全中國

富士康事件已經落幕，「郭台銘效應」卻正拉開序幕，中國社會、產業、經濟面的大調整鋪天蓋地而來，台商、藍白領工作者、投資人又該如何趨吉避凶？

文／郭庭昱

富士康事件在公司一週內兩度大幅加薪逾一倍後，中國媒體報導轉向「加薪是體現勞動者尊嚴」的角度，「牆內的事歸企業管，牆外的事歸政府管」，合力讓勞資事件落幕，但是百萬台商賴以生存的中國工廠，才正要面臨長遠衝擊，故事的背景，要從十一年前說起。

一九九九年夏天記者應郭台銘之邀，拜訪深圳龍華廠區，當時他大舉切入準系統，以低價、大量迎接電腦大廠的外包訂單，對手在中國的規模完全不能跟鴻海比，低價成為郭台銘手上的利劍。

當時郭台銘除了到國外跑客戶，多半待在龍華廠，每天工作十四小時以上，和台幹一起住在宿舍，辦公室沒有守衛、沒有祕書，顯見廠內很安全；牆上掛著與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的合照，和一張世界地圖。採訪直到深夜十二點多，他還興致勃勃地秀出「祕密武器」為知名電腦公司生產的流線型純白機殼。

鴻海在九九年營業額首次突破五百億元，當時，龍華廠有一萬六千名員工，在富士康工作很神氣，包吃包住，穿著制服走在路上有風，勞工們幾乎不太花錢，不能加班的工廠沒有人要去，攢下餘錢寄回故鄉，家人在鄰里間也是高人一等。

十一年後，郭台銘的鴻海集團年營業額達到二兆元，是九九年的四十倍；龍華廠員工四十多萬

中國的農民工面對貧富差距的不滿情緒，為「穩定壓倒一切」埋下變數



人，全中國員工達六、七十萬人，也剛好是當年的四十倍，勞工人數與營業額等比例放大，說明富士康本質上還是勞力密集企業，所有對手都來中國報到，低成本不再是必勝的尚方寶劍。

如今郭台銘被迫大幅加薪後，除了穩定員工軍心外，更將衝擊缺乏資金實力、政商關係的中小業者。試想，蘋果毛利率四〇%，富士康不到一〇%，還要承擔匯率風險，一支iPhone售價四九九美元，組裝賺不到十二美元，就算靠著零組件扳回一城，富士康終歸只是賺辛苦錢、小錢，蘋果賺的才是大錢。

中國特色：強國家、弱社會、小個人

今天，富士康或許有能力向蘋果、戴爾、惠普等客戶要求漲價，但是下游供應商有能力向富士康要求漲價嗎？恐怕很困難，如此一來，生存條件將比大廠更不利。據香港《經濟日報》報導，已有港資中小企業不敵工資壓力開始倒閉，相同的情況，也會使台資中小企業經營環境更艱難，已有專家預測，台商將再掀一波撤資潮。

富士康的勞資問題，在大幅度加薪後，還有中央出面解決「牆外的事」；但是，中小企業出了勞資糾紛，或者遇到罷工，才是無語問蒼天，不管是「牆內」或「牆外」，都是困難重重，有此經驗的台商，除了產品升級，就剩下遷廠、撤資一途。

曾任律師、現任中國社科院農村所教授的于建嶸，在去年底北京律師協會的演講中指出，「工人問題暴力化的趨勢在增加，〇九年七月，通化鋼鐵發生罷工，連總經理都被打死，之後不少地方老國企打出標語口號，其中一個叫『通化老大哥在行動，我們怎麼辦？』嚇得很多國有單位改制工廠的老闆不敢去上班。」當然，這起事件也全面衝擊了外商。

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，以社會主義的架構，雖然創造高速發展的經濟體，實則內部結構脆弱。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畫主任錢鋼，最近在香港《經濟日報》為文指出，中國是在「強國家、弱社會、小個人」的狀態下進入全球化時代，和香港「塑膠花時代」（編按：華人首富李嘉誠生產塑膠花起家），或台灣「出口加工區時代」均不同。

中國的社會主義，最早是「一頭大」，權力、財富牢牢抓在國家手上，造成一九七八年之前的均貧社會；鄧小平在七八年改革開放，讓少數人富起來，分一杯羹給資本家，變成國家、資本家「兩頭大」。過去二十年，中國轉型為世界工廠，雖然改善失業，但貧富差距擴大，富士康事件，點燃中國社會、產業、經濟面大調整的引信。

方向一：中國貧富差距不斷拉大，工資上漲將蔓延，且成為常態

富士康事件，郭台銘的作風及內部高壓管理固然有疏失，更深層的問題則來自於「牆外」的巨變，二〇〇〇年之後，中國城鎮居民所得快速成長，是鄉村居民的三倍以上；進一步分析，城鎮居民的貧富差距也在擴大中，二〇〇〇年時，最高一〇%城鎮居民所得是最低一〇%者的五倍，如今已擴大到九倍。城鎮和鄉村之間、城鎮內部的所得差距都拉大，長期下來，不但造成房價、物價上漲，也形成社會壓力。

中國國家統計局的統計，吉尼係數在二〇〇〇年超過〇．四的警戒線後，持續增加，世界銀行統計目前為〇．四八，僅次於巴西，但較美國、印度、韓國、日本都嚴重。目前，中國最富有二〇%人口擁有四七．八%財富，最貧窮二〇%人口僅擁有五．七%財富，共產黨靠著農人和工人起家，如果不妥善處理貧富差距，難保不會動搖國本。

〇八年起中國實施《勞動合同法》，如今富士康這家最大出口企業，

又調薪逾一倍，明顯是要由企業家出錢，達到「還富於民」的目的。富士康今日面臨的問題，是所有在中國勞力密集外商企業都有的困擾，影響數萬家台商，港商、韓商及日商也將同受衝擊。

方向二：工資持續上漲後，製造業占總產值比重快速下滑，服務業躥升

郭台銘加薪，只是開第一槍，所有在珠江三角洲、長江三角洲的製造業，未來幾年都難擋工資上漲的壓力，競爭力差的業者陸續退出或被淘汰，垂直、水平的併購將掀起熱潮，進行一波波產業調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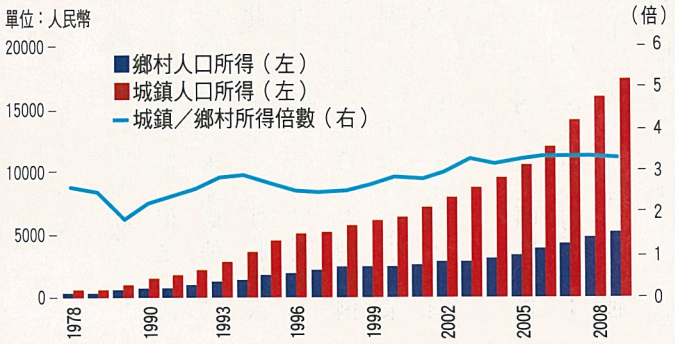
日本早在七〇年代工資開始上漲，工會組織年年進行「春鬥」、「秋鬥」，號召勞工向企業主爭取權益，春鬥的目標是年度調薪，秋鬥則是爭取年終獎金，研究顯示，日本平均工資自七〇年以後起漲，製造業占總產值的比重便連年下降，從四〇%一路降至三〇%；同期間，服務業從六〇%升至七〇%。

製造業在成本高漲的壓力下，被迫轉型，一是開發高附加價值的產品；二是開拓歐美等海外市場；三是尋找低成本製造基地，台灣也靠著低價優勢，開始接收日商的產業，但整體而言，製造業在日本的地位逐漸下滑。服務業卻乘機應運而生，餐飲、通路、金融、證券、娛樂、醫療等行業，接下製造業的棒子，進入蓬勃發展期。

中國終會步上日本模式，富士康事件正是轉捩點，工資持續上漲後，正考驗中國轉型的能耐。製造業無論往更落後國家、或者內陸移動，都難逃式微的命運，服務業興起已成定局。反映在投資思維上，勞力密集製造業本益比下調，通路、零售、醫療、娛樂、金融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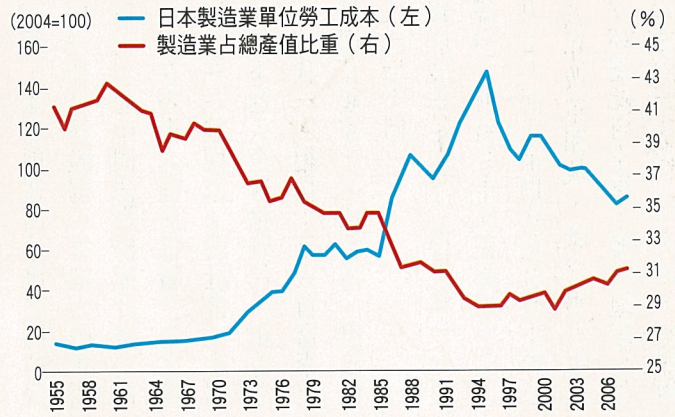
富士康事件啟動三大趨勢

1 中國貧富差距不斷拉大，企業調高工資、「還富於民」將成常態



資料來源：NBS，BofA Merrill Lynch Global Research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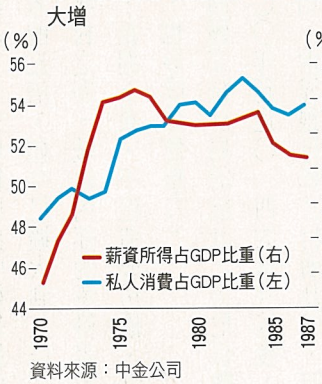
2 日本經驗顯示，1970年起薪資上漲成趨勢，製造業占總產值比重快速下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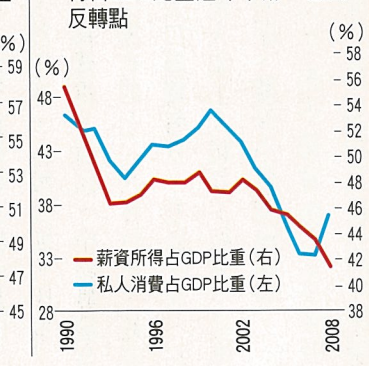
資料來源：中金公司

3 薪資上漲後，將刺激內需消費快速成長

1.日本經驗：1970年薪資快速攀升，帶動私人消費占GDP比重大增



2.中國現況：私人消費、薪資所得占GDP比重逐年下滑，已到反轉點



資料來源：中金公司

產業溢價消失　鴻海僅存龍頭溢價

從投資的角度，鴻海加薪需探討三個層面，首先，成本上升導致獲利下降；其次，競爭力相對同業是否變差，客戶若轉單勢必影響營收；最後，組裝產業長期風險上升。

法人圈普遍估計，鴻海調高基本工資三成到一倍，將造成今年獲利下降15至20%，金額約130至160億元間，明年影響更大，未來每年工資約上漲8至10%，已是不歸路。整體而言，鴻海今年ＥＰＳ（每股稅後純益）約8.7到9.3元，花旗環球證券的估值更低至8元以下。

鴻海調高工資，能不能轉嫁給客戶？客戶會不會轉單？其實鴻海除了組裝，最賺錢的是連接器、機殼等零組件，營益率已高於同業，因提供一條龍的服務，轉單機率不大；此外，就算客戶願意補貼工資，也會對同業雨露均霑。長遠的問題是，中國工資上漲已成趨勢，毛利低的組裝業衝擊最大。

就投資評價而言，過去，鴻海享受「雙重溢價」，一是高科技產品擴張的「產業溢價」，二是身為龍頭的「龍頭溢價」，如今產業溢價消失，但龍頭溢價還在，本益比會比同業高一些。

從前，低成本是鴻海最大優勢，如今，成本墊高已是產業的「共業」，只有像iPhone、iPad或革命性新產品出現，且鴻海成為主要製造商時，才有別於同業的優勢。目前看來iPhone、iPad均有機會，據了解iPhone明年的產量有可能較今年倍增，鴻海當然會受益。

（郭庭昱）



達志

中國工資上漲衝擊所有製造業

行業正站在有利勢頭上。

方向三：

工資上漲，內需消費大成長，順差金額縮減，人民幣升值壓力下降

無論是社會、產業面的調整，都會反映在總體經濟上。工資上漲，最終必然使廣大勞工受益，另一方面，中國也在加強三農改革（農業、農村、農民），期望透過提高農民、工人階級的所得，減輕貧富差異的負面衝擊。

農民和工人本來就是所得較低的階級，邊際消費傾向最高，簡言之，賺來的錢大部分都花掉，因此，農、工所得提高將直接刺激消費。依舊以日本七〇年代為例，在工資調高後，私人消費占ＧＤＰ比重隨著拉升，從七〇年約四八%，到八三年最高約五五%。

更重要的，內需帶動的經濟成長最具有乘數效果，工人加薪後去消費，店家賺錢後再擴張，大家都賺錢、大家都消費，形成良性的循環。股市最敏感，當五、六月鴻海、富士康股價大跌時，旺旺、康師傅股價卻有強勁支撐，亦呼應長期潮流。

今年歐洲債信風暴令歐元大貶，人民幣相對歐元大升值，加上製造業勞工成本上升已成趨勢，兩大因素均壓抑出口順差，據建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華而誠估計，今年順差占ＧＤＰ比重約三%，明年還會下降，長期而言，擴大內需也有助於壓抑順差，減輕人民幣升值的壓力，亦符合中國經濟轉型方向。

富士康事件已經落幕，「郭台銘效應」卻正拉開序幕，過去，台灣人的錢、人都被吸引到中國投資，現在，大陸工資持續大漲，將拉近兩岸間工資差距，加上〇八年以來，台商已展開一波返鄉潮，人、錢外流中國已經「止血」，台灣能夠營造何種環境來吸納回流的資金和人才，值得深思。